



□韦钦国

《范进中举》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一个故事。《儒林外史》成书于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书里虽然描写的是明朝的事情,但实则反映的是清朝的状况。

在许多人看来,范进是科举考试悲剧人物的代表:考了20多年都没能考中最低功名的秀才,长期受人排挤、挖苦、嘲笑,没有尊严;中举后又犯病发疯,成为大家的笑料,但事实并非全部如此。范进中举后参加了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进士,从此仕途顺畅,担任山东学道,最后官居三品,在读书人中算得上成功者,从这个角度讲,范进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。

范进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,这个年龄确实大了些,但三年后即57岁那年考中举人,这个年龄中举并非少数,如蒲松龄考十多回直至终老仍未中举者大有人在。“范进中举”中的是举人,参加各省乡试被录取的人才称举人,举人就具备了做官资格,但中举的前提是首先要考中秀才,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。

清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院试(通过者称秀才)、乡试(通过者称举人)、会试(通过者称进士)和殿试(排出进士三甲名次),县试与府试则属于预备性考试。秀才虽然是最低功名,但要考取秀才并不容易,只有通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级考试才能获得秀才功名。

县试由知县主持,儒学署教官监试,每年农历二月举行。县试作为童生考取秀才的初选条件也不宽松,并非所有读书人都可以报考。从程序上讲,报考人需要填写履历、亲供、互结、具结。履历即报考者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体格、容貌等。亲供是指填写报考者的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三代存歿情况,如属过继则要写本人亲生父母三代。互结是指五名报考者要互结互保,一旦有人作弊,则五人连坐。具结是指由已考取秀才功名的人做担保,保证报考者不冒籍、不匿丧、不替身、不假名。需要指出的是,清朝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限制了出身,娼优皂吏、乐艺丐蛋以及冷籍等人的子孙均不能参加科考。

县试在各县举行,一般考四场或五场,第一场为正场,如果第一场就被录取,被录取者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接下来的几场考试,如第一场未被录取,则失去继续参加下一场考试的资格,只能等到来年再考。

只有在县试中被录取的士子才有资格参加府试,府试多在每年农历四月举行,由知府主持,连考三场。府试程序近似于县试,同样需要填写履历、亲供、互结、具结等,只有通过县试、府试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院试。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,与乡试、府试每年各举行一次不同,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,报名等手续与府试、县试略同,考试地点一般在各省省垣所在地。通过院试的童生称“生员”,即民间所说的“秀才”。

获得“生员”即秀才,就有了相当的好处:享有了一定政治权利,进入乡绅阶层,见了县官不用下跪;可以免除赋税徭役,犯法后不能随便用刑拷问等,但秀才功名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具备了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资格,获得了真正做官的机会。获得秀才资格并非一劳永逸,学政定期对其进行考核,考试合格,都说五一要封城,再屯点采啥的吧才能参加乡试。事实上,秀才即便不参加乡试或乡试未中,只要在学政对其考评中合格,就可以在县衙做吏员(但不能做官)或开馆授徒,个人生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

范进考中秀才与一个叫周进的人有关。周进系山东兖州薛家集人,曾中过“县案首”,但从此在学业上未有进展,60多岁时只好跟随做生意的姐夫金有余来到省城济南做账房先生。在贡院遇到几位好心人,在他们资助下周进一路考取进士,三年后钦点广东学道(学政),其间在院试中遇到了童生范进。

此时的范进可谓落魄至极,“只见这些考试的童生里,有一个花白胡子的、面黄肌瘦、衣衫襤褸、头上戴一顶破毡帽,那人上来交卷时,衣服又被挂破了几块,显得更是衣不蔽体。”当周进询问时,范进诚实地回复,虽然报名册上写的是30岁,但实际已54岁了。因为院试三年举行两次,范进从20岁考到54岁,如果一次不落地考的话,30多年间确实可以考20多次。

在清朝,秀才平均录取率大约是2.5%,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,对包括范进在内的童生们来讲,考不中秀才是大概率事件,但考到54岁仍没考中倒也是少见。好在院试时周进再三阅读范进的文章,认为是“天地间之至文”,遂录为“院案首”,范进

这才考中秀才。在接下来的乡试中范进一鼓作气,获得第七名亚元,成为举人。但好事多磨,范进中举后其母因过于高兴而撒手归天,范进依例在家丁忧。有意思的是,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本人也仅是个秀才,并没有中举!

清朝举人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呢?清朝存续260余年间,共录取举人约15万人,每年平均不足600人。鉴于乡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,所以每次乡试各省平均录取举人约100人,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,事实上各省相差很大。“乡试中额,依文风之高下,人口之多寡,丁赋之轻重而定。”清政府根据各省人口、赋税、读书人数等给予各省不同的举人名额,没有极特殊情况名额不会轻易增减变化。乾隆元年(1736年)工科给事中曹一士称:“查各直省中额,人才多者额多,人才少者额少,故有大、中、小省之分,此国家因材而笃中正无偏之制也。”山东作为考生大省,乡试举人名额仅为69人,清朝中后期山东参加乡试的秀才约15000人,平均到每年真正的是千里挑一,但中举后举人的身份、地位与秀才又有天壤之别。

从仕途上讲,举人即便没有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(这种情况极少)或没有考取进士也可以做官,吏部和礼部会根据举人个人才能、长相、书法等综合考选,多数可以担任县丞或主簿,优秀者可担任推官、通判等职,类似于现在的副县长、副市长,被尊称“老爷”,进入正式的官僚体系,一届任满如果考评优异还有转正的可能。

从经济上讲,举人就更实惠了,举人比秀才拥有更大的免除税赋徭役的权利,清朝雍正年间规定,举人免除100—200亩的税负和十几户徭役,举人可以把这些免税免役的额度卖给别人,收取额外的钱财,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举人一家经济贫困的问题。换言之,举人即便不做官,也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。

在《儒林外史》中,从范进中举但尚未授官的那一天起,范进一家人的经济情况、社会地位等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官商士绅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,送钱送物:“张乡绅前来道喜,送了五十两银子,还有一套三进三间的房子赠予范进一家,之后又有送店面的、送田产的、投靠为仆的,两三个月的时间,范进家里便换了新样,媳妇也打扮得贵气许多。”

几十年的辛苦一朝变为现实,巨大的喜悦突然来袭,不疯才怪呢!唐朝有一位名叫孟郊的诗人在登第后畅写《登科后》一诗,道出了古今读书人登第后的真实感想:“昔日龌龊不足夸,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这种心境与范进何异!

人们经常在戏剧或电视剧中看到,有贫穷学子一路乞讨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的情节,这多半是出于剧情需要而设置的,此种情况在秀才到省城参加乡试途中或许会发生,但不太可能出现在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途中。中举后如果举人愿意参加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,就能享受朝廷的旅途报销,前往京城的举人是不必为路费担心的。

范进在家为母守孝三年后,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又考中进士,从此这个老男人的人生便开挂了。进士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,有清一朝260余年间共录取进士约27000名。与乡试一样,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,换言之,清政府每次会试全国录取进士平均约100人。进士是在举人中通过会试产生的,清朝每三年约录取举人600名,虽然录取率远高于秀才和举人,但实际算不上高,难度也很大。有许多后人熟知的名人都没能考中进士,如左宗棠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中,最后被慈禧赐予“同进士出身”,属于安慰性质的荣誉。对于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殿试,简单来说就是在进士中排出三甲等名次,殿试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,这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奖励和肯定。

县试第一名称“县案首”,府试第一名称“府案首”,院士第一名称“院案首”,如果某名士子在县试、府试、院士考试中均获得案首,称“小三元”。乡试第一名称“解元”,会试第一名称“会元”,殿试第一名称“状元”,如果某名士子在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中都位居第一,称“连中三元”。“连中三元”难度极大,既需要超人的才学,也需要机遇和一定运气,从隋朝兴科举至清末大约1300年间科举考试中,“连中三元”者包括文武在内尚不到20位。

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,优秀者进入翰林院,在中央六部任职,或外放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主官,后人熟知的各朝历史文化名人基本都是进士出身。范进考中进士后担任了御史,后来钦点山东学道。明朝末年始设提学道,清初延袭,清《郎潜纪闻初笔》载:“国初,凡提督学政,惟直隶、江南、浙江曰学院,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、侍读充之,余曰学道。”雍正四年废学道统称学政,每省一人,由皇帝在进士出身的中央官员中选派,一个任期周期为三年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范进中举前一家人穷困潦倒,仅有一间草屋,12月的天气范进仍穿着单衣,在村里经常遭受鄙视甚至毒打,受尽岳父谩骂和凌辱。其妻胡氏因长得丑陋,直到30多岁成了大龄“剩女”才嫁给范进,范进中举给家人带来了惊诧的变化,仅从其妻的变化上就可可见一斑。胡氏夫荣妻贵,变成了如是模样:“十月天的时分,穿着天青缎套,官绿的缎裙,督率着家人、媳妇、婢女,洗碗盛杯箸。”想必胡氏30多岁嫁给范进时,都不敢奢想会有这般待遇吧?

【故地往事】

## 滕县“五三小学”

□孙南邨

1928年5月3日,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之后,地处鲁南的滕县人民立即掀起了声讨日军暴行的活动。为不忘国耻,县城北门里黄家办的小学即更名为“滕县北关五三小学”。

滕县(今滕州)北门里黄家,在当地声望甚高,既是明清时期出过多位进士的名门世家,又是以抗敌御侮著称的英烈门第。民国初年,北门里黄家为滕县“八大家”之一,以开明绅士黄馥棠先生最为著名。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敬仰明末抗清将领滕县黄家瑞先生,曾题联赠予黄氏后人:“神圣家国,鞑奴入侵,蹂躏华土,腥风血雨河山碎,泪尽胡尘父老泣;匡国抗倭,功同史阁,坚守江淮,杀身成仁国魂在,烈名万世永垂馨。”以此赞颂黄家先贤,激励时人、后人。

民国初年,黄馥棠先生一家以教育救国为己任,聘任当地名师及师范毕业的学生为教师,腾出家中20多间房子,在北关办起新式小学。1928年为铭记“五三”惨案,学校更名为“五三小学”;1930年民国政府取缔私立学校,改为滕县第一学区区立第一小学。学校虽几经更名,民间仍以北门里黄家所办学校称之。当年这所学校办得如何?今未见有详实的文字记述,倒是从黄家所办学校走出许多新学、国学皆优的人士,至今在滕州多知其名。诗书画被当今学界赞誉的王学仲先生曾在此就读,他对黄氏父子的教学多有称道。桃李遍滕乡,翘楚天下闻,黄家办学硕果累累,名不虚传。泗上阁藏有当年这所小学自编课文的汇集本《文选》,从课文的选编档次之高,可证其办学理念非同一般。

《文选》为石印活页汇集装订而成,共184页,是滕县北关五三小学、滕县第一学区区立第一小学时期,课本之外的补充教材。其中,滕县北关五三小学的《国语讲义》部分,有《孟子陈仲子章》《宋玉对楚王问》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《漳南侠士传》《口技》《非攻》《沈云英传》《大铁椎传》《书剑侠事》等古诗文18篇,还有梁启超的《美哉我少年》及法国作家都德的《柏林之围》,共20篇,44页。

《滕州市教育志》记载,五三小学更名为区立第一小学,时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然而,五三小学选编的课文内容却多是宣扬英雄气节的文章。从中可以看出,济南“五三”惨案后,这所学校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,因此他们适时精心选编国文补充教材,从小学生开始传授志士仁人的气节意识,为国家培养坚贞不屈的人才。学校讲授国文的教师,由受过良好私塾教育的黄馥棠、黄项才昆仲担任;馥棠先生还是鲁南知名的书法家,兼教书法课。《文选》最后还附有五三小学石印《数学补题》18页,由此可知,这所学校不仅重视国文德育教育,对其他课程也很重视。

由私立改为区立学校后,选编的补充教材内容更是丰富多彩:宣扬英雄人物、抗击入侵的课文有《垓下歌》《木兰诗》《林烈士绝笔书》,有法国作家莫泊桑的《二渔夫》,还有邵元冲的《明耻——为‘九一八’一周年紀念作》;古诗文有《诗经》《战国策》《列子》选篇,有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刘基、戴名世、姚鼐等人的作品;现代作家选有鲁迅《孔乙己》等诗文4篇,另有周作人、蔡元培、冰心等人的作品。据王学仲先生回忆,中学时期,黄支田校长还曾亲手编写过课外讲义《字说》。从现存《文选》的选编到石印成文来看,当年滕县的这所小学师资力量雄厚,办学水平不低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这座县城的新旧文化知识氛围亦不寻常。

养根俟实,时穷见节!“五三”惨案后十年,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滕县县城,这里的人民在支援川军抗战时表现出积极踊跃、临战不退的顽强精神,受到川军官兵的一致称赞。抗战前线记者范长江报道《川军在山东前线》:“……黄馥棠(七十岁)辈皆奋身而出,随军队政工人员到乡下宣传……黄馥棠先生七代进士,滕县通家,特作七律古诗以迎川军将帅:‘天上遥瞻节钺临,安危须仗老谋深。晋文攘楚先三舍,忠武服蛮倚九擒。中府一朝诛二竖,阳光普照靖群阴。川军将帅皆韩岳,岂有神州竟陆沉。’”川军参战营长熊顺义回忆:“特别值得纪念的是,滕县城北关当时七十多岁高龄的黄馥棠老先生,我们守备县城驻守北关时住在他家,待我们如同至亲好友,无微不至。为了军民联合抗日,他老人家还经常到农村动员乡亲,积极配合。”

川军来滕抗敌,馥棠先生用书写先人黄冶山的诗作以赠,并身体力行行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,彰显了这位老人自济南“五三”惨案到悲壮的滕县之役,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精神。

投稿邮箱: qjwbrwq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李皓冰 美编:陈明丽